

香港
淪陷
日記



著了空薩



香港淪陷日記

香港淪陷回憶

作 者 薩 空 了
出 版 者 進修出版教育社
發 行 者 進修出版教育社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中華民國卅五年四月香港初版

H. 1——2000

前記

這本書現在拿到香港來付印，完全是我自己都未曾想到過的事。

一九四三年四月廿三日，在桂林把牠寫完，想即付印，不料在五月十七日我就被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廣西支局，——廣西省黨部調查統計室——的兩個特務，用汽車給綁架了去。幽囚了兩年零一個多月，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底，才恢復了自由。在我被囚的期間我會以不同的筆名寫印了幾本書，維持自己和兩個孩子的生活。但是這本書，却因為寫時未曾想到自己會失掉自由，記述的口吻不適用於筆名發表，遂失掉了出版的機會，以後我被特務由桂林押解到重慶，這本書的原稿下落如何，我都不知道了。恢復自由之後，才知道牠輾轉了三四個朋友的手，幸得保存，尤其應當感謝的是一個外國朋友，他為我負責由桂林帶了出來，不然，在桂林淪陷時，它也許和桂林的建築一樣，完全化為灰燼了。

我寫這本書的序時，曾說希望它有助於盟軍的收復香港，誰知道它竟要到香港收復後，我又回到香港來，才有付印的可能。時候拖的這麼久，這本書可說是只剩一點史料的價值了，不過這原稿終能幸存的曲折故事，益增了我做帶自珍的心情。所以決定無論如何要將他印出。

在決定付印前重讀了一次，我個人的感慨不是很短的話所能說完的。當時在香港共同奮鬥的戰友，已死掉了賴奮羊棗兩兄，一九三八年和我一同離港去新疆的杜重遠兄，也在這期間內被殺於迪化，至今

尸身在何都不知道。爲民主而戰的自己最熟的朋友，幾年中已失掉了三個，在失掉自由期間從難友口中所聽到的被屠殺的不知名的民主戰士更多到不計其數。不過他們的死亡是有代價的，在這本書中，爲求在國內出版而未會公開寫出的中國民主同盟，現在已在國內成爲正式被承認的政團了，政治協商會議已經成功，中國和平民主建國的計劃可說已經擬定，只等待我們去努力求其實現了。這在中國當然是一種極大的進步。這些民主戰士們，地下有知，知道他們的死亡已換到這樣的代價，他們也會感到安慰吧？到現在感到不安的，倒是我們這些後死者。繼續他們的遺志，推進中國的民主運動，宣揚他們一生的戰鬥成績，激勵未來的戰士，這都是我們的責任，可是我們現在所能作出來的却太有限了。我現在印了這本書，但爲了遷就寫時的環境，把最初在香港對全世界對全國人民宣告中國民主同盟已經成立的工作者的戰鬥事蹟，說的太不具體了，很想從新痛痛快快的寫過，可是眼前的工作逼得非常之緊，實在無從如願，只好就叫牠這樣與讀者相見。讀者說不定還可以在字裏行間找到一些側影？那麼這本書的印行，也許不算是全無意義，然而在我自己心上，總還是感到非常的遺憾。

希望中國的民主運動能够在短期內有更大的進展，使我們能够在戰鬥中畧有喘息的機會，來好好的寫些紀念戰友的文字吧！但這希望什麼時候才能够實現？在今日是無從估計的，不過我們努力以赴，想總不會太遠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八日

序

這本書是當香港九龍爲日本法西斯強盜佔領前後那個時期，我個人的日記。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進攻香港起，到一九四二年一月廿五日我逃出香港止，歷時共四十九天。

紀錄港九陷落的報告，市上已有兩本書印行，在報紙上發表過，沒印成單行本的報告更多，那都是在一九四二年春發表的。我這個日記遲至一年後才寫成，又遲了幾個月經過一度修改才決定付印。從書商生意眼的眼光來看，這日記寫出來的時間是太晚了，大家對香港九龍的淪陷，已不若一九四二年春那樣注意，銷路怕不會多；而在我自己來看呢，這日記在現在發表，還是太早，因爲太早，遂不能不影響了牠的內容。我的原意本打算在戰後再發表，那時說話似乎更比較客觀。可是爲什麼我又改變初衷，在現在想把牠付印呢？簡單的說是一種「敝帚自珍」的心情造成我這新的決定。

我從正式到報館作編輯到如今，已過了十六年以上的新聞記者生涯，這職業，在中國依照社會習慣本是一種被民衆內心裏賤視，表面上却要恭維的職業，大致和訟棍在社會上的地位差不多。而北洋軍閥之類的當政者，對付記者的辦法，則是一隻手拿著鈔票，一隻手拿著手槍，不怕你不屈服。在這種傳統的影響下，新聞記者如果有良心，有主張，有骨氣，有鬥志，即使倥倥不成爲殉道者，也必然的要弄的遍體鱗傷，而且在你死之前，有的是無窮的艱苦日子在等待着。——當一個國家步入真正的「民主」的過渡時期，這本新聞記者無可逃避的歷史的責任，我既生在這樣的時代中，又選定了新聞記者爲自己的終身事業，自只有堅強的負起自己應負的歷史使命。所以自從作了記者以來，兢兢業業的工作，惟

恐走錯了路。我常常警告自己，不應把自己所編出來的報紙，當作翌日即是覆轍的爛紙，而應當把牠看成那是組成人類歷史記載的一部分，假使不能將親歷的一切，忠實的寫出，那我們就是那些偽造歷史者的幫閒，即使出於無心，也是罪無可縮。因此抗戰以來，每逢遭遇到一個重大的事變，我即每天寫一點自己認為應當記下來的材料，那些也許是當時不能發表的，但希望在將來有一天，我能將自己親歷的一切寫出來，供給修史者參考。

不幸的是近幾年來生活太流動，幾度的逃亡流徙，什麼東西都漸散失，最使我心痛的，是八一三上海陷落前後，我所寫的日記的全部遺失，和我由香港到新疆途中所寫的日記的部分佚散。而且以目前個人的環境來講，流徙生活，仍在繼續之中，怕在香港所寫的日記又復散失，遂乘着枯居桂林，無事可作的時候，把牠陸續整理出來。整理出來後，卷帙更多，自己更難保存，遂與印行的意念，爲了印行，大加刪削一次，就成了今日這本日記的面目。

這會是一本值得讀的書麼？供給了多少值得保存的材料，我自己都不能答復，而是要由讀者代我答復的，不過有一點我覺得差可告慰讀者，就是在這四十九天的日記中只有因爲寫的太早而未寫出的材料，至於已寫出的材料，都是親見親聞，可憑徵信。對於敵人罪惡行動，我也沒有特加渲染，一切都是如實寫出，大家到現在已都知道在新加坡，日寇對華僑特別酷虐，在香港對華僑却相當懷柔，那並不是他們對香港華僑有好感，而是以一種政策爲中心，而形成的不同手段。所以我的報告，也許有可供研究敵情者參考的地方。此外也有些我談到了我們的盟國——英國，在港行政官吏的弱點，但那決不是攻擊，而是指出我們自己應當知道的自己的缺欠，在盟國反攻時，它也許會有點參考價值吧？……至少在我的自己的心上有着這樣一種期望。

一九四三年四月廿三日桂林

一九四一年

十二月八日 星期一

早八時，剛剛起床，突然淒厲的警報笛聲四起，連日香港本在緊張的神經戰空氣中，不斷的防空演習，一道道的緊急疏散命令，但在傳統的大英不可侵犯的傲氣氛圍中，香港居民幾乎沒有人肯信日本真會侵襲香港。就是一些研究國際問題的人們也不相信，日本會在一九四一年發動太平洋戰爭。所以這一天的警報傳出後，全港居民，誰都以爲又是防空演習。接着很清晰的轟炸聲音在九龍的東北角爆發，上空嗡嗡的飛機聲，跟着也歷歷可聞。家人是在重慶飽具大轟炸經驗的，都喊着這不像是演習，並集中到全樓比較玻璃最少的夾道中來，我默念着，「恐怕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了」，再想到自己肩負着的光明報的責任，已顧不及躲避空襲，只想立刻走出去打聽打聽真象。穿着睡衣走入盥漱室，一盆洗臉水還未由自來水的龍頭口放好，門外突然有人在極緊張的敲門。家人，女僕，沒有人敢去應門，我自己跑了去，門甫打開，一隻手槍已指對着我的胸膛。

「還有日本人住在這裏麼？」是一個英籍警察用英語詢問。

我回答說「沒有」！

「那麼你跟我走吧！」

「那裏去？」

「警署！」

「至少我應洗洗臉，換了衣服，」我指着所穿的睡衣給他看。他講「要快」，我遂重到盥漱室；英警舉着手槍也跟了來，我拿起剃刀要修面，他阻止我說「你可以帶了剃刀走，還可以帶一個放替換衣服的衣服箱。」我匆匆的洗了臉，然後到臥室換衣，我沒有問他爲什麼要我去警署，我以爲這或者又是由於一種誣陷，從到香港之後，我已經歷了許多類似的情形，所以只預備到警署再申辯，因爲，和一個警察爭辯是沒有用的。英警再跟我進臥室，還是手槍在握，家人都集聚在一旁，暫時忘了外面的緊張，而改注意到室內，在我俯首穿鞋的時候，那英警忽然問我有否移民證，我找出來給了他，他仔細讀了移民證後問我：「四川」是中國還是日本，由於這個啓示，我陡然憶起，我住的房子，三個月前住的是一個日本人，大約他以爲我是日本人才來逮捕吧？我遂告訴他我是中國人，過去這個房子曾住過日本人，但是久已搬走了。

英警收起了手槍，然而在收起之前他還用手槍在我面前幌了一下，說「如果我證明你不是中國人，下次再來時，我就要不客氣的應用牠了！」不等我再說任何的話，他已衝下樓去，我趕到騎樓，看見一輛警署的囚車正在緩緩的駛走。

這一場喜劇插曲使我更堅信了太平洋戰事業已爆發，否則英警決不至逮捕日人。匆匆囑咐家人多買一些食物之後，便到斜對面的范長江兄住所，一面想利用他的房東的電話，一面想聽聽他已獲到了什麼消息，走上三樓，他也還穿着睡衣，問有什麼消息，他仍說據報告是演習，我把我所遭遇的喜劇告訴了

他，他也想起來適才就在他的對面北京道上，有一家日本商店爲英警破門而入，但日人已全部逃走。各方印證，想來戰事業已開始，他連忙也穿起了衣服，決定同我一起過海到香港去。下樓的時候，遇見了才由香港過來的秋江兄，他帶來了日本對英美正式宣戰的消息，並說港九交通，政府已有新命，由香港可以自由過九龍，由九龍過港，軍人而外須先到亞士厘道西人青年會旁門領通行證。

走到尖沙咀，証實了秋江的話，回到西人青年會已擠得水洩不通。那時正是早九時，住在九龍的香港各機關職員都應在這時上班，大家全過不得海，可是都希冀或者可以通融，不肯折回，於是尖沙咀似乎變成了大規模的羣衆大會場面。九龍公共汽車照常行駛，由九龍城深水埗來的車，帶來了啓德機場，深水埗英兵營及其附近被炸的消息，更增加了這些羣衆的騷動。漢口道的幾家麵包店，因爲香港政府業經下令統制糧食，黃油麵包已須排班候買，不到一小時，各店完全宣佈售罄。向隅的大有人在。

我知道候渡輪已沒有了希望，便拉長江去看平時每小時二元的汽艇是否還可搭乘過海。在九龍倉前的汽艇碼頭旁，我發見了不只有汽艇還有舢板，在招攬客人過海，也就在一瞬間我發見了生活書店和讀書生活社的徐伯昕和黃洛峯二兄同在那裏待渡。待渡的人非常多，每一隻船靠了碼頭不論是汽艇還是舢板，都立即擠滿了人，我和長江擠在人羣中去競爭，我擠上了一條汽艇，再看他，却和徐黃二人擠上了另一隻舢板。我的汽艇，十分鐘後便在香港皇家碼頭靠了岸，他們的舢板後來聽說走了約一小時才得過海，因爲那天海面上有小小的風浪。在汽艇中同渡的人，從他們的交談中可以聽出來，多半是中央信託局派在香港辦事的人，他們說昨夜八時，消息就不好，某行經理請了許多客，聽到消息不好，結果飯也未吃，便喊來「的士」（零雇小汽車）把大家分頭送了回去。這段話使我憶起昨夜十一時後，我確聽見過隱約的砲聲，當時仍以爲是香港防空洞的開山工程在繼續進行，沒想到敵人已攻入了九龍新界。

這一天香港的清晨是和往常兩樣了，照例星期一的清晨，街上往來的人，都是匆匆忙忙，奔赴所業，今天則是大家都在街上徘徊觀望。英國情報部香港辦事處發出第一號公報，證實日本不只進攻香港且同時進攻馬來亞與菲律賓。很快的英文報已據此出了號外，中文報只得根據情報部的公報寫幾張簡單的壁報貼在各通衢，娛樂戲院前電桿上貼了一張星島日報的壁報只寥寥的寫了「日本今晨同時對英美宣戰」幾個字，就永遠有人圍繞着不去，似乎要在那一句話之外另找出其他的字句！

爲什麼中文報不能像英文報一樣的迅速發出號外，這就是香港英文報不須經港政府檢查，而中文報必須經過華民司新聞檢查處檢查的結果了！戰事卒起，檢查老爺還未辦公，報自然不能出！

八日早的香港各報，在民衆心中，完全成了歷史，沒有人要看，香港新聞界的麻木遲緩，民衆到此才切實感到。

我到報社是十時，很迅速的決定了兩件事，（一）向銀行提款（二）購買糧食，囑託了同仁去辦。前者是預防萬一，後者是預備長期扎拚下去。我到報社時，梁漱溟先生已先在社中，使我感覺非常快慰，因爲我知道他昨晚在九龍有事，途中會憂慮，怕他去了今早不得回港。不意他昨夜竟未過海。經過一次短短的商談，我又跑出來探聽消息，在中區B銀行重遇到長江，沒有談幾句話，警報又發出了，B銀行是十層以上的鋼骨水泥大廈即使直接中彈，比普通防空洞也許還要靠的住一些，可是幾丈高的玻璃窗如被震碎，那碎片也會使人體無完膚，不過雖明知道不安全，我們並沒有離開B銀行到防空洞中去，我們知道香港的防空洞與人口比，相差太遠，雖然香港當局在防空演習中並未叫居民演習過入洞，（大約也是因爲洞不敷分配吧？）可是人類的求生本能一定會叫他們在轟炸中回洞裏跑，洞裏一定擁擠不堪。如果擠進去擠不出來，我們身上的責任將怎麼辦？

此外我不進防空洞還有兩個原因：（一）是從早晨第一次轟炸就看出來香港不是主要的敵人進攻目標，飛機來襲不過三五架，與我在重慶經歷過的每次一二百架，實有小巫大巫之別，危險性自然小的多。（二）香港的防空洞在過去幾個月中成爲一個香艷故事的背景——防空總監史柏堅大人，劉美美小姐，陳永安夫人這些漂亮的演員都在防空洞舞台上登場，因此我每想到香港防空洞的安全性，就不免要聯想到劉美美收到的生日禮品——一隻價值幾千港洋的手鏢，還有那銀行中來歷不明的劉美美的五千港幣存款。於是我對香港防空洞的信仰也就不免大大的縮減。

何況香港這時還有電話可通，不只可通全港，還可以叫通九龍，而B銀行一共有四五具電話可資利用，我當然不願捨開這既方便又相當安全的地方！

緊急警報，轟炸。這次炸的不是九龍而是香港，警報解除，陸續又見到幾個朋友到B銀行來，傳說炸的地方是山上炮壘和中央警署附近。在轟炸中我們聽到了高射砲和高射機關槍的聲音，但顯然的火力不夠，敵機還能安然的俯衝下來投彈。集聚到此的朋友，都在議論着英國爲什麼沒有飛機來應戰，有幾個樂觀的朋友以爲這次日人是以卵擊石自取滅亡，就是看事穩重的朋友，也認爲初期的挫敗在所難免，但是香港能够支持二三星期一定可以獲得援軍，而香港的防守，幾個月大約還有把握。在議論紛紛中，會在卡爾大使任內任駐華英大使館新聞參贊的貝特蘭（J. Bertram）也到B銀行來了，我問他有什麼新的消息，同時表示了對香港當局臨事之無辦法的不滿。因爲半日來香港的秩序相當的紊亂A. R. P.（防護團）出動了，可是並無補於實際，因爲有許多事，等待政府決定，A. R. P. 才能發生作用，現在的A. R. P. 是香港政府的手指，但是沒有大腦的指揮，牠和廢物也差不多。甚至A. R. P. 本身的吃飯問題，當時都無着落，其餘可以想見。

貝特蘭，今天不像平時那樣健談，他沒有帶給我們甚麼消息，他一面翻閱B銀行訂閱的路透社電稿，一面說我們只有耐心等待。警報解除，已近三時，我們還沒有吃午飯，幾個人決定到Dairy Farm去，剛走出B銀行又是警報，我們還是走到Dairy Farm，因為那裏是更新的鋼骨水泥建築，吃飯的地方，是閣仔等於地下，吃飯的人已把整個閣仔擠滿，在這裏我碰到了中宣部駐港特派員鄧友德先生香港國民日報社長陳訓畚先生等也在吃飯，和鄧在一起閒談幾句，說到戰事發生後的困難，鄧說他感到最大的困難還是錢，我說有中央銀行在港，你們還會像我們辦民間報的人一樣感覺困難嗎？他說手續沒有理想的那麼容易啊！——我懂得一元港幣在今天早八時和午十二時所能換得的物資有多大的差別，我當然也了解鄧所感到的那手續所給他的痛苦有多大！分手時鄧講，「現在是大家一致對外的時候了」，我說：今日當然是「抗日第一」！

Dairy Farm的午飯這一餐並不如平時壞，飯後回報社，知道由銀行提出來的款項都是五百元，一百元的大票，米買到了足夠維持同人十天上下伙食的數量。紙張也還可以供給一個相當的時間。目前的緊急問題大致有了安排，再出報社到中環，乘巴士（公共汽車）到跑馬地向一個朋友打聽消息。巴士相當的擁擠，街上已有中文晚報和號外出售，但消息並不如早上出的英文報多。在跑馬地遇見了不少的朋友，大家一致的意見，是由港政府的切斷港九交通來看，似乎香港將採死守的策略，大家應當設法把家屬朋友乘着輪渡之外的舢板等交通尚有的時候，趕緊集中到香港來，以便安心幫助香港政府，戰到最後。離開跑馬地回到中環，天漸漸黑了，又遇到長江，還有陳翰笙兄，我提議去吃飯，乘便談一談。這次我們去的是Wisemen。香港電話公司的地下室。從早晨起香港的小餐室都已停業或漲價，倒是這些大的餐館還在維持着本來的信譽，不亂敲竹槓。建築又安全，不必擔心吃到一半要逃警報，所以我們選擇了Wisemen。

這個餐館向來生意很好，今晚是太冷落了，燈也開的很少，室內好像籠罩着一層愁慘的霧。只有極少數的桌子旁坐了食客，而且不是着軍服，便是穿着A. R. P. 制服，像我們三個這樣的便服顧主，簡直沒有。

在吃飯時翰笙曾說，我是學歷史的，我居然沒能預見到太平洋戰爭這樣迅速爆發，真是白白的學了。他又告訴我們艾黎先生曾勸他迅離香港，可是他以為沒有這種必要，所以沒有走。

這個問題我以為我們用不着這樣怨艾自己，這不一定是知識不夠的問題，還是我們憑以判斷的材料出自偽造的宣傳所致。如果我們能清晰的知道英美與日本的軍備真象，那我們自可斷定太平洋戰爭之不可免了！

晚飯吃過已經八時，三個人走出來，在由地下室上梯階走出時，我們有點邁不開步。這是香港第一次的真正Black out之夜，過去若干次的防空演習雖經當局三令五申，如有人洩露燈光，可能處以一千元港幣的罰金，然而每次演習的結果，無論由官方的報告或我們的私人經驗來判斷，都是成績不佳。今夜是完全不同了。全港一片漆黑，街上靜的像一個死市，我必須再回報社，便和長江翰笙分了手，在伸手不能見五指的街道上走，幸而路還熟，我尚辦得出我應走的方向。神覺業已無用，遂以聽覺來辨別街上來往的行人，在最熱鬧的皇后道中，娛樂皇后兩影院前都沒有遇到一個人，在過去防空演習時，這裏照例要擠上幾百人等着購票，以使用電影來消磨掉這黑暗的夜晚，罩了一層藍布的手電筒，東閃西爍也以此地為最，今晚却什麼也沒有。我像是這街上惟一的人類，愈走脚步愈邁得快，一方為了自己感覺孤獨，一方也是因為儘可橫衝直撞，無庸顧慮妨害到什麼人，在山德忌笠街轉向威靈頓街的時候，突然同一個人撞了一個滿懷，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也是放開了步走，又因為是下坡更加快了速度，

所以撞的相當嚴重。我聽見他喊了一聲「哎喲」，但繼續走了下去，我也照舊走上擺花街，我被撞的地方是眼額之間的肩骨部份，走到報社已腫了起來，俞頌華兄這時業經坐在編輯桌旁開始他的工作，我們談了一下今後本港戰事消息獲得的辦法，他拿出來「面速力達」油膏叫我塗在眉端，因為在封閉甚嚴的室內電燈下，已看的出被撞處腫的很高，又處理了一些社中雜事，決定再搭天星碼頭的渡輪回九龍的家料理一下家事，同時也是想證實一下是否自香港過九龍可以自由通行。

十時過五分到了天星碼頭，干諾道一帶只有這個碼頭內還有幾盞用黑布籠罩了的電燈，一條船剛剛開走，收費的窗口沒有人，問一個職員，多少時間有船來往一次，據說是每小時一次，下一班是十一點。五分鐘後，九龍開了一條船載來一批軍人，和A. R. P. 再沒有其他的乘客。我就上了這條船預備等候五十分鐘後開駛回九龍。陸續的有人上船，仍然不是軍人便是A. R. P.，我是謹有的便裝乘客。大家都異乎尋常的不大說話。船上的燈也用黑布遮掩了，等於沒有一樣，海的微細波浪，打在船身上，歷歷可聞，更顯出來空氣的靜寂。

我利用了安靜的五十分鐘整理了一下這一天的經歷，我記起來過去防空演習時香港當局的許多話，他們說在空襲警報中仍要維持港九交通，只有緊急警報時，渡輪才停航，又說空襲警報中民衆不應息燈就睡，能維持日常的活動，不使燈光外露才算成功，——警報中香港和重慶不同的地方，便是重慶在緊急警報時，電燈公司便將總電門關閉，停止全市電燈電力的供給，香港則照常供給，但希望無燈光外露——由這些地方來看香港政府的原意，是在戰時，仍希望維持港九的常態。不料今天戰事才起，港當局即宣布切斷港九交通，有這個必要麼？我很懷疑。我以為這個決定所引起的港九的恐慌；對作戰時實有極不利的影響。因為很顯然的，九龍只是因為香港太擁擠才開闢出來的住宅區，所有香港的經濟，政治，文化

中心機構，都在香港。九龍除了警署分署之外，沒有更主要的行政機關，九龍沒有一家銀行的總行，沒有一張報紙在九龍出版。在英人方面是有意造成這種局勢，因為香港是割讓的土地，而九龍有一部分是租借地，九十九年期滿（九龍租借換文自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起生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底已租四十五年）仍有交還中國的可能，他們當然不願把主要的機關設在九龍，中國人在香港辦事業，本是附麗英人而存在，於是也就追隨着英人，把主要機構設在香港以求與他們往來方便，而忽略了英人所以如此的主要意義。民國廿七年十二月大上海陷落，我山上海到香港，籌劃立報在香港復刊時，曾有把社址設在九龍的意思，我會和香港許多僑領討論到香港與九龍在主權性質上的不同，辦報是否在三九龍可討到一些政治上的方便的問題，可是他們差不多都以爲這是一個新奇的說法，在習慣上，他們已認爲九龍也完全是割讓給英國的了！因爲獨力無法改變這種事實，又因爲在三九龍孤立，有許多技術上的不便，所以立報，還是在香港復刊。——由此我們看出來九龍如果失去香港的連繫，將是一個如何嚴重的問題。爲了省房租住在九龍每天過港辦公的山手到口的公務員洋行職員，切斷港九交通，放在他們面前的就是失業的恐慌，有錢的寓公，錢與貴重東西，都存在香港銀行中，切斷港九交通，放在他們面前的威脅，是昨日還是富翁，今日已是一貧如洗。還有九龍有幾個大的倉庫香港的商家也有許多貨物存在那裏，切斷港九交通，對他們也是極大的打擊。像各報社的報紙便多存在九龍倉，香港如果能够堅守到二三個月以上，各報會對無紙而停刊，使香港對戰事無從知道，使港政府的宣傳無法達到民間，這一切似乎香港政府都未考慮，突然改變了過去想維持港九交通的意念爲切斷交通，實在叫人大惑不解。

下午同九龍朋友通電話時，得知香港的報紙，英文報，中文號外和晚報，在九龍下午還有的出賣，價錢增加了一倍乃至數倍，這並不是香港政府准許了報販可以自由往來，而是爲了生活，甘願由天星碼

頭帶報過海之後，再冒僉坐舢板偷渡回來，命令完全與民衆要求抵觸時，下命令的人等於和自己開玩笑，因為那命令一定會遭遇到反抗，這不過是一例而已。

十一時十分的時候，我已跨上了九龍的尖沙咀碼頭，我們這一船載過來的人似乎是到九龍半島來探險的探險隊一樣，因為在那寬濶的大街上，我們這一羣，竟是僅有的人類，碼頭上巴士沒有了，的士沒有了，人力車也沒有了！

回到漢口道家中，家人仍在用防空燈罩罩着的電燈下等候着沒有睡，我說了明天全家過海到香港去住，東西應該檢一下，便洗臉準備就寢，突然，警報聲又起，已睡的孩子也驚醒了，正計劃着是否應當躲避這次夜襲時，忽然警報又解除了，歷時只五分鐘。後來聽說是中國的民航機來港迎接要人和他們的眷屬，港方誤為敵機來襲，以致造成了這一次的「自擾」！

九日 星期二

昨天一天相當的疲倦，睡的又晚，今晨七時，還未起床，警報又來。是否應當到防空洞裏去？頗費思考。第一不知道敵機數量會不會增加？第二在尖沙咀漢口道一帶只有半島酒店旁空地上有避難室(Shelter)數所，這種避難室是一人高矮的一種鋼骨水泥的平屋，頂與牆的厚度約半英尺，入口處另有一道鋼骨水泥的牆掩避，躲避炸彈碎片，機槍掃射還有用處，如果直接中彈必然炸穿，所以並不安全。並且就每室的面積與官方規定的避難人數來看，也嫌未能顧及空氣是否流通，有否發生窒息悲劇的可能。推想在這緊急的時期避難室中的人一定要超過規定數目，窒息的危險，自更增加，當然以不去為是。至於防空洞